

馬來西亞砂拉越的南島語族人類學研究史的 主題探析：親屬、宗教與族群關係

徐雨村*

摘要

砂拉越位於婆羅洲西北側，共有 20 餘個原住民族群，就語言與考古的根源屬於南島語族，佔當地過半人口。自 1842 年至 1941 年英國探險家布洛克建立砂拉越王國統治長達 100 年，戰後續由英國殖民統治，1963 年取得短暫自治後，隨即參組馬來西亞。砂拉越因英語通行及政治相對安定之故，19 世紀末開始吸引學者前來研究。戰後學術研究更加豐沛，國際學術社團及本地博物館出版延續不墜。本文採取人類學學術史的角度，檢視砂拉越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以及南島語族學術研究史的脈絡，針對三項重大研究主題：親屬、宗教、族群關係等，探討學者的創見與學術累積，及其對整體人類學知識的貢獻。

關鍵字：南島語族、砂拉越、親屬、宗教、族群關係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砂拉越地處熱帶的婆羅洲島西北側，現為馬來西亞的一州，如圖 1 所示，砂拉越北邊鄰接汶萊，東北邊鄰接馬來西亞沙巴州，南側與東側鄰接印尼的加里曼丹，西邊則為南中國海，面積廣達 124,449.51 平方公里，2020 年人口 2,560,600 人。

婆羅洲領域廣袤，面積 748,168 平方公里，就地理自然人文環境方面具有許多共同點或相似點。然而，該島嶼分由馬來西亞的砂拉越州、沙巴州、汶萊與印尼的五個加里曼丹省分治理，各自在獨特的政治文化經濟歷史脈絡下發展，而有自成一格的社會文化特性，因此對於婆羅洲的認識，可分由不同政治區域來著手。砂拉越自成一格的屬性源自其政治歷史，1842 年由英國探險家布魯克建立砂拉越王國，至 1941 年統治長達 100 年，戰後續由英國殖民統治，1963 年取得短暫自治後，隨即參組馬來西亞。



圖 1、在當代馬來西亞國境，砂拉越位置圖

資料來源：Wikipedia Common,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d/Sarawak_in_Malaysia.svg

砂拉越是個多元族群社會，包括原住民族群、19 世紀之後移民至此的華人及印度人、信仰伊斯蘭教的馬來人；其中以原住民族群占多數，原以泛靈信仰為主，近代逐漸改宗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各族群的現有人口，依據砂拉越州「州元首辦公室」(Premier's Department) 的經濟計畫室 (Economic Planning Unit) 所提供的 2020 年人口普查資料。如

表 1 所示，總人口為 2,560,600 人（以百人為單位計）。依據族群類別區分，第一大族群為伊班人（Iban）723,400 人，佔全州人口的 28.25%；華人 619,900 人，24.21%；馬來人 607,800 人，23.74%。比達友人（Bidayuh）197,000 人，7.69%；其他土著（other Bumiputera，包括 Bisayah·Kelabit·Kayan·Kenyah·Penan 等）141,300 人，5.52%；馬蘭諾人（Melanau）133,400 人，5.21%；印度人 14,800 人。

表 1、砂拉越 2020 年人口統計依族群別分

（人口數以百人計）

族群別	人口數	佔總人口比例
伊班人（Iban）	723,400	28.25%
華人（Chinese）	619,900	24.21%
馬來人（Malay）	607,800	23.74%
比達友人（Bidayuh）	197,000	7.69%
其他土著（other Bumiputera）	141,300	5.52%
馬蘭諾人（Melanau）	133,400	5.21%
印度人及其他（Indian + others）	14,800	0.58%
非馬來西亞人公民（non-Malaysians）	123,000	4.80%
總人口	2,560,600	100.00%

資料來源：Economic Planning Unit under the Premier's Department. 2021. Sarawak Facts and Figures, 轉引自 Lim (2022)。

砂拉越原住民族的起源，學者多採用考古學及語言學證據，推測其大多具有南島語族的源頭。首先，據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的考古學研究，南島語族源自華南與臺灣一帶，在大約距今 6000 年前到達臺灣，大約在 5000 到 4500 年從臺灣傳播到菲律賓、蘇拉威西、婆羅洲北部等地（Bellwood, 1991: 92）。再者，布勒斯（Blust）推測在西元前 2000 年前後有一個「原型西北婆羅洲語」存在於沙巴西海岸，數世紀後分為兩

群，一支留在北婆羅洲（今沙巴），另一支則進入砂拉越北部的巴南河（Baram）河口，成為現今民都魯（Bintulu）、巴南河下游、肯雅族（Kenyah）、加拉畢族（Kelabit）的語言。大約在西元前三到四世紀，從婆羅洲西南隅發生一場範圍甚廣的遷移，跨越婆羅洲前往蘇門達臘東側、馬來半島及大陸東南亞的海岸地帶（Blust, 1988: 56）。

Victor King 認為，學者依據語言學的證據，指出在東南亞海岸部落人民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一致性，包括長屋、陶器製作、樹皮布、紋身、二次葬、複雜的超自然信仰、弓箭、非單系（血親型）繼嗣等（King, 1993: 82–93）。

本文擬就砂拉越南島語族的人類學研究成果進行分析，範圍放在 19 世紀至今的砂拉越民族誌，試圖探索下述的研究問題：砂拉越人類學研究史的發展歷程及其特色為何？如何受到世界人類學潮流的影響？砂拉越民族誌有何特色主題？在分析架構上，本文將依據文獻分析的結果，聚焦於四項主題：學術史、親屬、宗教與族群關係。

二、砂拉越人類學研究史

在人類學研究史方面，砂拉越的人類學研究既是東南亞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整體人類學的一部分，歷經殖民時期與後殖民時期的發展。

砂拉越的科學研究始於 19 世紀殖民勢力的進入，然而專業人類學家的大規模研究直到二次大戰之後才展開。回顧歷史，歐洲人從 16 世紀展開對東南亞的探險與殖民行動，但砂拉越一直受到忽略而處於邊緣位置，維持由汶萊蘇丹鬆散治理的狀態。直到 19 世紀中葉才有歐洲人勢力，英國探險家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e）1839 年來到砂拉越，協助汶萊蘇丹平定伊班人（Iban）的動亂，並於 1841 年獲汶萊蘇丹指派為砂拉越總督（Governor of Sarawak），旋於 1842 年成為統治者（拉者，Rajah），建立砂拉越王國（Kingdom of Sarawak）（King, 1993: 141）。由於詹姆士·布魯克是白人，有別於東南亞各國的黃種人統治者，故有「白人拉者」（White Rajah）之稱。砂拉越王國統轄範圍，起初僅有古晉（Kuching）的砂拉越河（Sarawak River）流域。從 1853 年到 1905 年間，汶萊蘇丹將婆羅洲西北側的領土，先後六次交予布魯克政權統治，總面積最終達

124,449.51 平方公里。¹

King 與 Wilder 指出，19 世紀殖民晚期的亞洲學術研究由東方學者所主導，但研究主題聚焦於有關印度教、佛教及伊斯蘭教等「大傳統」的考古、歷史、語言及文獻研究，往往忽略低地鄉民的「小傳統」或弱勢少數族群部落，將之保留給行政官員兼學者 (scholar-administrator) 在公餘進行研究 (King & Wilder, 2003: 33)。在 19 世紀前半葉華人尚未大量移入之前，砂拉越居民多為信仰傳統泛靈宗教的南島語族或經商的穆斯林馬來人，明顯欠缺「大傳統」及相關文獻記載，因此未能成為東方學者屬意的研究對象。

儘管如此，統治砂拉越王國的布魯克家族依然重視資料的累積，從 1870 年代開始發行《砂拉越憲報》(*Sarawak Gazette*)，除了作為政府的紀事，拉者布魯克鼓勵行政官員書寫描述砂拉越地方民族誌及風俗的文章。1891 年於首都古晉建立砂拉越博物館 (*Sarawak Museum*)(Appell, 1976b: 8)。該館從 1911 年起發行《砂拉越博物館學刊》(*Sarawak Museum Journal*)，內容涵蓋人類學、社會科學、歷史、自然史，成為砂拉越在殖民及後殖民時期最具累積性的出版品，持續出刊至今。²

由專業人類學家以砂拉越為研究主題，所出版的第一本人類學專書是哈登 (A. C. Haddon) 與史塔特 (Laura Start) 合著的《伊班族或海達雅編織及其模式》(*Iban or Sea Dayak Fabrics and Their Patterns*) (1936)，成為人類學物質文化織品研究的經典。哈登與砂拉越的關聯可追溯到他在 1898 年至 1899 年率領的劍橋大學托勒斯海峽探險隊 (Cambridge University Expedition to the Torres Straits)。³他與幾位隊員在回程時取

¹ The Geography of Sarawak. https://sarawak.gov.my/web/home/article_view/159/176/#:~:text=The%20Geography%20of%20Sarawak&text=It%20stretches%20some%20800%20kilometres,area%20of%20124%2C449.51%20square%20kilometres

² 砂拉越博物館學刊僅有兩段時間脫期，分別是在 1917 年到 1925 年，以及從 1937 年到 1949 年，大約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的恢復期。哈里森 (Tom Harrisson) 在該刊 1949 年之後的復刊扮演重要角色，並展現他對於砂拉越各項主題的興趣。

³ 托勒斯海峽介於澳大利亞最北端與新幾內亞島之間，最狹處約為 151 公里寬。據哈登的說明，這次探險主要停留在該海峽上的穆瑞島 (Murray Island) 長達四個月，部分成員轉往砂拉越的巴南河 (Baram) 流域繼續進行研究 (Haddon 1898)。哈登等人於 1904 年出版《劍橋大學托勒斯海峽探險隊報告》(*Reports of 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其中第 5 卷名為《太平洋島民的社會學、巫術與宗教》(*Sociology, Magic and Religion of the Western Islanders*) (Haddon, Rivers, Seligmann, & Wilkin, 2010)。

道砂拉越，在砂拉越博物館從事研究，並籌畫幾場田野考察之旅（King & Wilder, 2003: 51）。

戰前知名的砂拉越民族誌作品是行政官員兼學者荷斯（Charles Hose）與麥克道格（William McDougall）的兩巨冊《婆羅洲的異教徒部族：對其體質、道德與心智狀態的描述，附加對其族群關係的若干討論》（*The Pagan Tribes of Borneo: A Description of Their Physical Moral and Intellectual Condition, with Some Discussion of Their Ethnic Relations*）（1912）。荷斯曾在砂拉越王國擔任公務員 21 年，其中有 18 年駐在北部的巴南河流域，並曾前往鄰近島嶼、英屬北婆羅洲（British North Borneo，即今沙巴）、荷屬婆羅洲（Dutch Borneo，即今印尼加里曼丹）等地。麥克道格則曾於 1898 年參加哈登博士的托勒斯海峽探險隊，兩人此後共同執筆寫成二大卷巨著，第一卷內容包括婆羅洲的地理、歷史、族群、物質條件、社會體系、農耕、長屋生活、河流生活、叢林生活、戰爭、工藝技術等。第二卷內容則有精靈概念及相應作為、靈魂概念（以葬禮、捕捉及驅趕靈魂為例）、泛靈信仰、巫術咒語及符咒、加央人（Kayan）的青年與童年、婆羅洲的民族學、政治等項。

布魯克家族自 1842 年開始統治砂拉越，1941 年 9 月慶祝建國百年，但 12 月即遭日軍攻佔，第三任拉者維納·布魯克（Vyner Brooke）逃往澳洲。聯軍雖於 1945 年反攻，並於日本投降後取勝，但拉者無意繼續經營王國，在 1946 年 7 月 1 日將砂拉越主權讓渡予英國殖民部，砂拉越從此成為英國殖民地。因此，英國人類學家在砂拉越戰後最初 20 年的研究享有優勢。英國殖民地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The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創立於 1944 年）資助砂拉越的專業人類學研究，這些研究顯然側重協助行政及發展。知名英國人類學家李區（Edmond Leach）於 1947 年造訪砂拉越，1948 年提交報告給委員會，他所陳述的研究目標就帶有應用取向，提出社會學研究計畫，以提供政府資料，衡量地方對政府推動的發展計畫所產生的反應（Leach, 1950: 7, 16-17）。該委員會所支助的四項砂拉越人類學研究計畫包括：弗立曼（Derek Freeman）對於伊班人游耕者研究（1955）、葛帝斯（William Robert Geddes）對沙東陸達雅人（Sadong Land Dayaks）的研究（1954）、莫里斯（Harold Stephen Morris）對海岸馬蘭諾人（Coastal Melanau）的

研究 (1953)、田汝康 (T'ien Ju-k'ang) 對於城鎮華人的研究 (1953) 等 (King & Wilder, 2003: 32)。其中以弗立曼的作品受到最大關注。弗立曼抱持功能論的傳統，認為砂拉越盛行的血族型社會 (cognatic society) 有別於世系群社會 (lineal society)，在欠缺大規模共作 (corporate，共同營生) 繼嗣群體的情況下，成功提供了秩序與結構 (King & Wilder, 2003: 59)。本文將在第二節詳細討論。

隨著砂拉越在 1963 年取得自治並參組馬來西亞聯邦，英國對砂拉越的影響力逐漸減低。相對地，由於冷戰時期美國對於東南亞的關注，美國學者對砂拉越的參與及影響漸增，1968 年設立的國際學會「婆羅洲研究會」(Borneo Research Council) 位於緬因州的菲利普斯 (Phillips)，1969 年起發行《婆羅洲研究學報》(Borneo Research Bulletin)，並出版探討薩滿教、觀光、性別、靈魂觀、建築與發展的專書。亦有來自加拿大、澳洲、歐洲、亞洲等地學者的參與。⁴

在砂拉越、半島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本地人類學家的研究，反映在數本期刊的內容當中：*Sarawak Museum Journal*、*The Journal of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Asian Ethnicity*、*SOJOURN* 及其他。

1992 年砂拉越大學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正式成立，Poline Bala (2017) 回顧其學術發展，1997 年設置東亞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2003 年設立人類學與社會學系，延續砂拉越博物館長年以來的族群研究傳統，為跨學科的砂拉越／加里曼丹研究奠立根基。Poline Bala 出版加拉畢族 (Kelabit) 的邊境移動與族群認同議題的專書 (Bala, 2002)。Michael Leigh 著有多本專書，討論砂拉越的族群、社會政治趨勢、地方治理等議題。林煜堂 (Lam Chee Kheung) 探討砂拉越馬來人、內陸民族 (Orang Ulu) 的人口變遷。Hew Cheng Sim 探討砂拉越原住民的城鄉遷移與性別，包括伊班人與比達友人。蔡靜芬 (Elena Chai) 研究客家人的認同與宗教信仰、大伯公信仰等 (詳細書目請見 Bala 2017)。曾於 1998 年至 2003 年任教於 UNIMAS 的 Wan Zawawi Ibrahim 於 2008 年主編《砂拉越的再現、認同與多元文化主義》(Representation, ident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Sarawak) 一書 (Zawawi Ibrahim, 2008)。

⁴ Borneo Research Council 官網，<http://www.borneoresearchcouncil.org>

設址於詩巫的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出版砂拉越華人研究著作，對於原住民與華族的關係亦有著墨，於 2005 年出版林青青的《砂拉越伊班族的民俗、說唱藝術及其華族文化色彩》一書。

三、親屬是社會組織原則或文化象徵：血族型社會及屋社會

人類學的親屬研究可採 1970 年代為分水嶺，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親屬研究在 19 世紀的發韌到 1970 年代為止，強調對特定社會的社會組織面向的認識，史奈德 (David Schneider) 對於親屬研究的質疑，終結了此階段。稍後，象徵及詮釋取向的觀點開啟了第二階段，多年後親屬研究再度復興。這兩個階段的對比可用幾項二元對立組合來呈現：社會組織／文化象徵、客位／主位、社會形式／意義。以下將從這二階段的研究發展，來闡釋砂拉越民族誌對親屬研究的貢獻。

第一階段的代表性理論是世系群理論 (lineage theory)，庫帕 (Adam Kuper) 將此理論發展細分為古典時期與現代時期。古典時期代表人物是摩爾根 (Morgan)。摩爾根及其他學者提出一套從亂婚到家庭，以及從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的發展順序。現代時期則隨著人類學在戰後的爆炸性發展而興盛，世系群理論變成功能論的一部分，由英國的非洲研究學者所提倡，例如弗提斯 (Meyer Fortes) 及伊凡普里查 (Evans-Pritchard)。他們提議「世系群模型」(lineage model) 是理解社會結構的有效概念。世系群係指共同經營、在地化、外婚、單系的繼嗣群體 (Kuper, 2004: 80-84)。

學者基於兩項理由對世系群理論提出質疑：首先，在婆羅洲（以及後來在大洋洲及歐洲社會）發現了另一種組織類型——親類 (kindred)——以個人認定的親屬範圍所建立的血族型社會 (Cognatic Society)；因此，（從非洲民族誌找出的）世系群並非唯一維繫社會凝聚力的親屬組織原則。其次，更具批判性的觀點則是主張世系群及血族型社會都不是土著概念。李區 (Leach) 是首位探討砂拉越血族型社會的學者 (King & Wilder, 2003: 59)。跟隨李區的脚步，弗立曼 (Derek Freeman) 在他的《伊班人研究報告》(Report on the Iban) 採用砂拉越中部拉讓江上游的伊班人長屋民族誌，從土著觀點闡釋了血族型社會的特性。伊班人的每

幢長屋是由 20 至 50 個家庭單位所組成的集合體，每個家庭單位擁有「家庭房間」(*bilek*)、倉庫(*sadau*，位於 *bilek* 正上方)、開放空間的廊道(*ruai*)與露臺(*tanju*)。其中以 *bilek* 最重要，此一名詞也用來指稱在此共居、共爨、共食的家庭群體，弗立曼因此就以 *bilek-family* 的概念，呈現伊班人家庭生活空間與親屬關係的特性。*bilek* 的空間不大，最大僅有 25 英尺寬、24 英尺深，平均居住人口為 5.75 人。在他調查的 107 個案例當中，三代同住的主幹家庭有 47 例(44%)、兩代同住的核心家庭有 38 例(35%)。一個人可藉由出生、收養及婚姻等關係，來取得加入某個 *bilek* 的資格，大多以出生身分來加入其父方或母方的 *bilek*。⁵配偶可選擇加入夫方或妻方的 *bilek*。即使說同胞兄弟姊妹對於 *bilek* 具有相等的繼承權，但家中的長嗣（長男或長女）會被特別稱為 *pun bilek*，意指這個 *bilek* 的根源或基礎（Freeman, 1970: 1-31）。

伊班人的親屬稱謂體系是雙邊對稱(*bilaterally symmetrical*)，用相同親屬稱謂來稱呼父方與母方的同輩份同性別長輩，人們可由父親或母親方面追溯親屬關係，且兩邊對等。伊班人長屋的每個成員屬於擴展雙邊繼嗣的群體，稱為親類(*kindred*)。弗立曼主張，親類指稱的是血親範疇，包括自我的父方與母方的所有親人(Freeman, 1970: 66-67)。個人在一生當中，可藉由更換居住地點，而隸屬於不同的親屬群體。

長屋並不是集體擁有土地的共同經營群體，在同一座長屋的每個 *bilek* 家庭都擁有均等的土地權。長屋的領導權分配給兩個職位：世俗領導者(*tuai rumah*)及儀式領導者(*tuai burong*)。領導權的取得及交接都不是透過繼承，而是藉由長屋成員的公開討論，包括男人與女人在內，討論候選人的人格特質，包括對於習慣法(*adat*)的知識、公平無私、調停爭端的能力、以及演說的說服力(Freeman 1970: 111)。

弗立曼在莫達克(Murdock)主編的《東南亞的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of Southeast Asia*) (Murdock, 1960a)一書，重述他對伊班人的分析。弗立曼主張，伊班人的社會結構完全依據血親原則的基礎，包括了英國人所稱的親友(*kith and kin*)；換言之，結合了血親、姻親及其他親人。透過婚姻所建立的配偶連結關係是使得親類關係得以形成，並代代相傳的龐大動力(Freeman, 1960: 72)。莫達克則在該選集試圖平息有關

⁵ 基於出生關係有 418 例，佔 67.9%；收養 53 例，8.6%；婚姻 140 例，22.7%。

所謂「非單系社會」(non-unilineal society) 等等分類術語的爭端。他認為「非單系」這個術語適用於描述任何的自願組織，因此不適合專門用來指稱親屬歸屬。莫達克將血族型社會體系界定為「小型家庭居住單位，是最重要的社會、經濟與掌握土地的群體——從每個角度來看，完全都是共作的」(Murdock, 1960b: 2)。

亞佩爾 (Appell) 強調在婆羅洲幾乎所有原住民皆屬血族型社會，為此他主編《婆羅洲諸社會：以血族型社會結構理論所做的探索》(The Societies of Borneo: 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Cognatic Social Structure) (Appell, 1976a)。亞佩爾指出在砂拉越血族型社會研究的兩個重要性：首先，砂拉越各族群的文化多樣性，為血族型社會的研究提供了受控制比較的機會，在於砂拉越的某些社會是階層化社會，而其他則是平權社會。其次，血族型社會是研究「行動者中心」的決策過程的絕佳機會 (Appell, 1976b: 13)。

在砂拉越的人類學親屬研究當中，血族型社會似乎是具發展潛力的主題。然而到了 1970 年代，這項主題連同世系群理論，都遭到史奈德 (David Schneider) 的嚴厲批評。史奈德依循帕森斯 (Parsons) 的理論，強調人類學研究的目標是「文化體系」，也就是象徵與意義的體系。他認為，關於社會組織的議題不應與文化體系的議題混為一談。史奈德主張人類學應該探究當地人的日常行動、當地人的分類範疇、象徵與意義，換言之，也就是「整體的文化體系」(Schneider, 2004: 262-272)。

史奈德所強調的是文化及象徵的層面，而不是社會與組織的層面。這個觀點也呼應 1970 年代以來象徵與詮釋人類學的興起。此後親屬研究陷入低潮，直到 20 年後才恢復活力。關於「屋社會」及「親近性」(relatedness) 的研究，標示著親屬研究的第二階段。

李維史陀 (Levi-schau) 1988 年在英文版的《面具之道》(The Way of Masks) 一書提出「屋社會」的概念，涵蓋建築、人群與概念之間的相互關聯性。Janet Carsten 與 Hugh-Jones 主編以「屋社會」的思考脈絡的論文集 (1995)，但她們希望超越這個概念，提供更全面的建築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 及身體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 觀點。探討主題包括：家屋與身體之間的緊密連結，家屋是個人的延伸，以及家屋、身體與心靈的互動 (Carsten & Hugh-Jones, 1995: 1-

2)。「屋社會」的概念根植於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家屋結合了一系列相對立的原則或社會形式，例如父子關係／居處、父系繼嗣／母系繼嗣、升級婚／降級婚、遙遠婚姻／鄰近婚姻等。李維史陀也強調聯姻的核心地位，配偶不僅是家庭核心，也是各家庭間的緊張關係核心所在（前尹書：8）。

在這本論文集當中，Monica Janowski 的論文就是對於「屋社會」這個概念在婆羅洲血族型社會的適用性測試。她發現，在砂拉越的加拉畢人（*Kelabit*），「透過家屋做為媒介，處理的是群體內部的議題，而非介於不同群體之間的議題」（Janowski, 1995: 86）。

Carsten 在她為復興親屬研究所做的努力，選擇將「親屬」替換成「親近性」（relatedness）。她並不否認受到史奈德所影響，但她認為史奈德並未處理介於生物、自然與人類本性之間的衝突。親近性這個概念則能反映在各個社會，親屬關係所具有的多樣性的象徵與意義（Carsten, 2000: 4-5）。

四、宗教：二次葬、獵首與薩滿

法國社會學派聚焦於宗教對維持社會凝聚力所發揮的功能及其象徵，例如涂爾幹（Durkheim）、赫茲（Robert Hertz）與牟斯（Mauss）等人的作品。這項立場由范基尼（van Gennep）與特納（Victor Turner）所提出的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及中介性（liminality）等概念所增強。在砂拉越從事研究的麥考夫（Metcalf）延續了這條理論路線，藉由對貝拉鸞人（Berawan）的二次葬（secondary burial）研究，主張葬禮是通過儀式。在這個架構下，麥考夫分析葬禮當中的死亡、生命力及獵首之間的關聯性。赫茲在 1907 年引用婆羅洲的達雅族研究，特別是（印尼）加里曼丹東南部的納朱人（Ngaju）所寫的作品「對死亡的集體再現的研究」（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Death）（1907）一文，然而這篇文章及其相關理論主題，一直等到 1960 年譯為英文才受到重視。從那時開始，關於「通過儀式」特別是葬禮的討論，就吸引了許多人類學家關注（例如 Goody, 1962; Needham, 1973; Douglas, 1971; Huntington & Metcalf, 1979；皆轉引自 King & Wilder, 2003: 126）。在此架構下，死亡這個通過儀式就如同年輕人進入成人世界

的成年禮。

杭亭頓（Huntington）與麥考夫回溯人類學對於葬禮的研究，並將之連結到涂爾幹社會學的象徵層面，強調將個人整合到社會生活。進一步闡釋特納與范基尼的通過儀式及中介性理論，轉換過程的主題似乎在葬禮的象徵論具有主導性（Huntington & Metcalf, 1979: 5-12）。依據麥考夫的研究，貝拉彎人的完整喪葬儀式前後耗時數年，包括一場葬禮、一段為期一年或數年的暫時存放、第二次處置儀式（*nulang*）、以及永久存放（Metcalf, 1982: 19）。再者，麥考夫援引牟斯的「整體社會現象」（total social phenomenon）的概念，強調葬禮在貝拉彎人社會生活的核心位置。由於貝拉彎社會欠缺社會階級，為原先的領導者所舉行的隆重葬禮，就成為再度肯定及再次協商政治權力的舞臺（Metcalf, 1982: 21-22）。

基於政治理由而延遲數年之久的葬禮，必須累積大量米穀以饗參與群眾及賓客。逐漸在自己家族嶄露頭角的領導者會選擇在最近故世者的第二次處置儀式上，做出政治聲明（以取得政治權力）。延遲舉行第二次處置儀式的另一個理由，就是需要花費時間為亡者構築一座精心製作、飾有雕刻的墓園（前引書：158-159）。

麥考夫也嚴謹探討獵首跟葬禮禁制之間的關聯性。成功的獵首有助於增強部落的生命力，並以某種隱晦不明方式打斷先前發生的一連串死亡事件（前引書：125-127）。雖在拉者布魯克所主導的「締結和平」（pacification）之下，貝拉彎人無法再度獵首來取得頭顱，但貝拉彎人葬禮依然出現了不須獵取新頭顱的獵首儀式。麥考夫解析這項儀式把最近故世者心中的忌妒轉型成其他象徵（某些代替特定身體部位的東西），到最後移轉到犧牲的雞隻上頭（Metcalf, 1982: 112-131, 1996: 252-263）。

神聖儀式的模稜兩可（ambiguity）介於神聖化（sanctify）／汙染、療癒／有害、有需要／危險之間。「屍體跟靈魂一樣，都是會產生恐懼、希望及焦慮的客體」（Metcalf, 1982: 110）。獵首及葬禮最後階段包含了泥土、活力與性行為。在儀式當中的性解放象徵著生命力的恢復（前引書：131-135）。

麥考夫將獵首放在宇宙論的脈絡裡面來詮釋，為我們開啟了對於婆羅洲戰爭與儀式的嶄新觀點。有關婆羅洲的獵首報導最早出現在 20 世紀

初的遊記（Cator, 1905）及殖民地行政官員兼學者所撰寫的民族誌當中（例如 Furness, 1902; Hose & McDougall, 1912），多半注重傳達恐懼感或描述獵首相關的器物與儀式。這致使西方人對婆羅洲（再加上其他東南亞及大洋洲）族群產生了刻板印象或汙名。然而從麥考夫的觀點，各族群發動獵首的具體理由及其與宇宙觀或性別之間的關聯，可能會有所差異，我們應以各族群主位觀點來重新思考獵首。

儘管獵首者意象對於東南亞原住民似乎是個汙名，然而獵首的意義卻在當代的觀光脈絡下被重新創造。例如古晉附近山區的比達友人（Bidayuh）自從拉者統治時代早已不再獵首，但他們選擇在砂拉越文化村（Sarawak Cultural Village）表演獵首舞蹈，並建造敵首屋（*barok*, head house），成為再現其傳統文化的載體（Winzeler, 1997: 201–204）。

就宇宙論而言，薩滿信仰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層面。依據葛拉漢的研究（Graham, 1987），伊班人的 *manang* 一詞可用來指稱一組複雜的意義：祭司、占卜師、巫醫、本地治療者及薩滿。對於恍惚出神狀態的分析，有的學者抱持懷疑態度而質疑其真實性，其他學者則試圖描寫治療儀式的內容或薩滿的性格，並提供精神分析、性別或象徵的解釋。葛拉漢討論在治療儀式及通過儀式當中的薩滿、經過轉型的薩滿，以及被獵取的人頭在伊班人宇宙論的地位（Graham, 1987）。

溫澤勒（Winzeler）在他主編的《人們見到的與看不見的：婆羅洲的薩滿、靈媒與附身》（*The Seen and Unseen: Shamanism, Mediumship and Possession in Borneo*）（1993）一書的導論，指出婆羅洲宗教的五個焦點包括繁殖力（特別是稻米）、獵首及使用頭顱、鳥占（augury）及解讀其預兆、處理死者、以及治療病人及受困擾者等等。每個族群的宗教專家分化程度不同，其發展極致分別是成為祭司及薩滿等。人們改宗為基督教徒及伊斯蘭教徒，對於薩滿信仰產生了強烈影響；然而，近年依然有綜攝或復振型態的宗教形式興起，特別是在晚近的宗教自決潮流之下（Winzeler, 1993）。

五、族群關係

砂拉越的族群文化複雜多元，族群關係的主題具有發展前景。目前有兩個主要研究趨勢：族群識別及其社會動力、主權及跨境族群關係。

Victor King 主編的《婆羅洲社會論文集》(*Essays on Borneo Societies*) (King, 1978)，論文標題以族群名稱排序，這顯示在婆羅洲研究當中，族群識別依然是重要且未解的議題。盧騷 (Rousseau, 1990) 討論族群的自我認同與自我命名的議題，主張在婆羅洲中部的族群分類有兩種動力：概念動力 (conceptual dynamic) 與社會動力 (social dynamic)。前者主要依據語言及文化的相似性，後者則是某些群體基於歷史與政治的考量而結合成同一族群 (Rousseau, 1990: 55)。

依據盧騷的看法，我們可從族群分類的社會動力，分析砂拉越的兩個族群名稱：達雅人 (Dayak) 與伊班人 (Iban)。King 追溯達雅人這個詞彙的源頭及其發展過程，發現此名稱原先是沿海居民用來稱呼居住在上游，尚未改宗世界宗教的異教徒。荷蘭人及英國人也採用這個統稱。時至今日，達雅人這個詞彙由後殖民時代的各政黨所採用，以尋求所有非穆斯林—馬來族群的支持 (King, 1995: 3)。

依據威德立 (Wadley) 的研究，目前所稱的「伊班人」，在 19 世紀之前並未自我認同是相對同質的族群範疇，直到 19 世紀後半葉，統治砂拉越的布魯克家族開始將這群原住民帶進更廣大的國家行政、司法及教育體系當中，並在各個相對孤立的社群間，建立起溝通管道 (Wadley, 2000: 86)。最後河岸居民放棄原本的各種自稱，轉而採用「伊班人」這個稱號，替換了先前的泛稱「海達雅人」(Sea Dayak) 或達雅人 (King & Wilder, 2003: 209)。

然而，陳志明 (Tan Chee Beng) 指出在砂拉越「達雅人」這個族群範疇包括伊班人與比達友人在內，用來跟內陸族群 (Orang Ulu)、馬蘭諾人 (Melanau) 與華人相對比。在當代政治脈絡中，達雅人意欲透過這個泛族群稱號來動員，主張他們具有土著 (*bumiputera*) 的權利，或表達對發展議題的關注。他們也透過組織族裔政黨來爭取協調其權利 (Tan 1997)。目前砂拉越最大政黨即為砂拉越土著保守聯合黨 (Parti Pesaka Bumiputera Bersatu，簡稱 PBB，英文名 United Bumiputera Heritage Party)，2018 年國會大選獲得 13 席國會議員席次，2016 年州議會選舉在砂拉越州 82 席州議員當中獲得 46 席，穩坐該州執政地位。在 2018 年大選之前，土保黨一直是執政聯盟國民陣線 (Barisan Nasional, BN, National Front) 的成員黨。2018 年大選國民陣線敗選，土保黨及其他三

個砂拉越政黨聯手退出，合組「砂拉越政黨聯盟」(Gabungan Parti Sarawak，簡稱 GPS，英文暫譯 Sarawak Parties Coalition)，成為馬來西亞第三大政黨聯盟，並繼續在砂拉越州執政。⁶

近來主權議題研究，聚焦於跨境移工及婚姻(cross-border labor and marriage)，呈顯出身分認同的協商與日常政治經濟力量的展現(Amster, 2005; Amster & Lindquist, 2005)。Amster 分析砂拉越州的跨境婚姻及日常論述。位於砂拉越高地的年輕加拉畢人(Kalebit)遷入城鎮謀生，其中一部分回到高地來維持祖先所遺留的水稻田。但水稻種植所需的勞動力大量仰賴鄰近的印尼加里曼丹的伯利安人(Berian)。雙方有著類似的文化及語言，因此伯利安女子婚入加拉畢男子變得常見。即使兩國在此地的邊境管制鬆散，人民可自由來去，然而從加拉畢人對於伯利安人的國家身分論述，以及馬來西亞政府對婚入伯利安女子的國籍身分認定，依然呈現兩者在經濟及性別的不平等(Amster, 2005: 28–35)。

六、結論

筆者檢視了砂拉越人類學的研究史與三項重要議題。在學術史方面，相較於東南亞其他大傳統的研究，砂拉越的人類學確實處於邊緣地位。然而，從 1842 年至 1941 年間統治的砂拉越王國，透過《砂拉越憲報》、《砂拉越博物館學刊》的出版，特別是行政官員兼學者，累積了地方史與民族誌資料。戰後，砂拉越主權移交給英國，促進以發展主題的人類學研究。1963 年砂拉越取得自治並參組馬來西亞，但東南亞處於冷戰時期的熱戰區域，吸引美國及其他國家學者的研究。1992 年砂拉越大學成立，東亞研究所、人類學與社會學系前後成立，深化了本土人類學家的參與。

頭一個重要議題是親屬，東南亞親屬組織的多樣表現形態，已吸引許多世代的人類學家前往研究。其中關於血族型社會(cognatic society)及屋社會(house society)這兩項重要理論，有部分論據引自砂拉越的民族誌。本文討論這兩個親屬理論的發展脈絡及其與砂拉越人類學的關

⁶ 資料來源：Wikipedia articles: Parti Pesaka Bumiputera Bersatu, Gabungan Parti Sarawak。砂拉越政黨聯盟的另外三個成員黨是「砂拉越人民黨」(Parti Rakyat Sarawak, Sarawak Peoples' Party)、砂拉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民主進步黨」(Parti Demokratik Progresif, Progressive Democratic Party)。

聯。1970 年代之前，親屬研究強調世系群及社會組織等主題，砂拉越的血族型社會透過弗立曼的伊班人長屋研究，而廣為學者所認識，看似具有獨特前景。然而，1970 年代史奈德質疑以社會組織觀點認識整體文化實質的有效性，呼應了當時正在崛起的象徵及詮釋研究，卻使親屬研究陷入低潮。一直等到李維史陀於 1988 年提出「屋社會」，Janet Carsten 在 1990 年代提出「親近性」，重新提振了東南亞的親屬研究，砂拉越的長屋社會再度成為重要的民族誌討論焦點。

第二項議題是宗教，重要主題是二次葬、獵首與薩滿。砂拉越的宗教研究深受法國傳統影響，涂爾幹 (Durkeim) 及牟斯 (Mauss) 的思想。法國學者赫茲 1905 年關於死亡的集體再現民族誌，1960 年譯為英文後受到重視。麥考夫將通過儀式的概念運用在砂拉越原住民二次葬的分析，並討論宗教、二次葬、獵首及生命力之間的宇宙論關聯性。二次葬本身具有再度確立與協商政治權力的象徵意義。獵首則是為了增強部落生命力，儘管早在拉者時代獵首風俗就已被廢棄，近世學者對此習俗的詮釋有助於破除昔日砂拉越的獵首者汙名。如今，在比達友人的文化展演上，獵首舞蹈與敵首屋都成為再現傳統文化的載體。

第三項議題是族群關係，包括族群識別及其社會動力、主權與跨境關係。在砂拉越族群多樣性的脈絡下，學者早期的研究側重於族群識別。同時，基於歷史與政治考量所產生的族群社會動力，「伊班人」與「達雅人」這兩個族群稱號的指涉範圍均有相當程度的擴充。在當代政治脈絡下，族群稱號更成為重要的政治動員範疇，結合了更多族群，以有效抗衡政治對手。關於加拉畢族與印尼鄰族伯利安人的跨境婚姻主題，透過國籍身分論述，呈現兩國在邊境地帶的經濟與性別的不平等。

參考文獻

- 林青青。2005。《砂拉越伊班族的民俗、說唱藝術及其華族文化色彩》。
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 Amster, Matthew H. 2005. The Rhetoric of the State: Dependency and Control in a Malaysian-Indonesian Borderland.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12: 23-43.

- Amster, Matthew H. & Johan Lindquist. 2005. Frontiers, Sovereignty, and Marital Tactics: Comparisons from the Borneo Highlands and the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6(1): 1-17.
- Appell, G. N., ed. 1976a. *Studies in Borneo Societies: Social Process and Anthropological Explanation*. Detroit: Northern Illinois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Appell, G. N. 1976b. Introduction. Pp. 1-25 in G. N. Appell, ed., *Studies in Borneo Societies: Social Process and Anthropological Explanation*. Detroit: Northern Illinois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Bala, Poline. 2002. *Changing Borders and Identities in the Kelabit Highlands: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f Growing up in a Kelabit Village Near the International Border*. Kota Samarahan: Unit Penerbitan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 _____. 2017. An Overview of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Pp. 283-302 in Victor T. King, Zawawi Ibrahim, & Noor Hasharina Hassan, eds., *Borneo Studies in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Singapore: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 Bellwood, Peter 1991.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Scientific American*, 265(1): 88-93.
- Blust, R. A. 1988.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26: 45-67.
- Carsten, Janet. 2000.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New Approaches to the Kinship Rese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sten, Janet & Stephen Hugh-Jones, eds. 1995. *About the House: Lévi-Strauss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tor, Dorothy. 1905. *Everyday Life among the Head-hunters and Other Experiences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Longmans, Greens, and Co.

- Economic Planning Unit under the Premier's Department. 2021. Sarawak Facts and Figures, as cited in Lim, How Pim. 2022. Sarawak's Population Rises to over 2.56 Mln in 2020. *Borneo Post Online*, June 16. <https://www.theborneopost.com/2022/06/16/sarawaks-population-rises-to-over-2-56-mln-in-2020/>
- Freeman, Derek. 1970[1955]. *Report on the Iba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 Furness, William H. 1902. *The Home-life of Borneo Head-hunters: Its Festivals and Folklore*.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 Graham, Penelope. 1987. *Iban Shamanism: An Analysis of the Ethnographic Literature*. Canberra: the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 Haddon, A. 1898. Th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Nature*, 59: 174.
- Haddon, A., W. H. R. Rivers, C. G. Seligmann, & A. Wilkin. 2010[1904]. *Reports of 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Volume 5: Sociology, Magic and Religion of the Western Islan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se, Charles & William McDougall. 1912. *The Pagan Tribes of Borneo: A Description of Their Physical, Moral and Intellectual Condition with Some Discussion of Their Ethnic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 Huntington, Richard & Peter Metcalf. 1979. *Celebrations of Death: The Anthropology of Mortuary Ritu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nowski, Monica. 1995. The Hearth-group, the Conjugal Couple and the Symbolism of the Rice Meal among the Kelabit of Sarawak. Pp. 84–104 in Janet Carsten and Stephen Hugh-Jones, eds., *About the House: Lévi-Strauss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ng, Victor, ed. 1978. *Essays on Borneo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ng, Victor. 1993. *The People of Borneo*. Oxford: Blackwell.
- King, Victor. & William D. Wilder 2003. *The Modern Anthropology of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utledge Curzon.
- Kuper, Adam. 2004[1982]. Lineage Theory: A Critical Retrospect. Pp. 79–96 in Robert Parkin & Linda Stone, eds., *Kinship and Family: An Anthropological Reader*. Malden: Blackwell.
- Leach, Edmond. 1950.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Sarawak: A Report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a Social Economic Survey of Sarawak* (Colonial Research Studies No. 1).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Presented to the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London, March 1949–July 1949.)
- Lim, How Pim. 2022. Sarawak's Population Rises to over 2.56 Mln in 2020. *Borneo Post Online*, June 16. <https://www.theborneopost.com/2022/06/16/sarawaks-population-rises-to-over-2-56-mln-in-2020/>
- Metcalf, Peter. 1982. *A Borneo Journey into Death: Berawan Eschatology from Its Ritual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_____. 1996. Images of Headhunting. Pp. 249–290 in Janet Hoskins, ed., *Headhunting and the Social Imagination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rdock, George Peter. 1960a. *Social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 _____. 1960b. Cognatic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Pp. 1–14 in George Peter Murdock, ed., *Social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 Rousseau, Jérôme. 1990. *Central Borneo: Ethnic Identity and Social Life in a Stratified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chneider, David. 2004[1972]. What is Kinship All About? Pp. 257–274 in Robert Parkin & Linda Stone, eds., *Kinship and Family: An Anthropological Reader*. Malden: Blackwell.

- Tan, Chee-beng. 1997. Indigenous People, the State and Ethnogenesis: A Study of Communal Associations of the 'Dayak' communities in Sarawak, Malay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8(2): 263–284.
- Wadley, Reed L. 2000. Reconsidering an Ethnic Label in Borneo: The "Maloh"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t Volkenkunde*, 156: 83–101.
- Winzeler, Robert L. 1993. Introduction: Shaman, Priest, and Spirit Medium: Religious Specialists,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Borneo. Pp. xi–xxxiii in Robert Winzeler, ed., *The Seen and the Unseen: Shamanism, Mediumship and possession in Borneo*. Williamsburg: The Borneo Research Council.
- _____. 1997. Modern Bidayuh 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Sarawak. Pp. 201–227 in Robert L. Winzeler, ed.,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State: Politics, Land, and Ethnicity in the Malayan Peninsula and Borneo*.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 Zawawi Ibrahim, ed. 2008.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Sarawak*.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Dayak Cultural Foundation;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Persatuan Sains Sosial Malaysia

Thematic Analysis on th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Austronesians in Sarawak, Malaysia: Kinship, Religion and Ethnic Relationship

Yu-Tsuen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Located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Borneo, Sarawak is home to 20 officially recognized Sarawak native peoples. These ethnic groups are classified as Austronesians based on their 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legacies, and they constitute a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n Sarawak. Sarawak was ruled by the British Brooke family from 1842 to 1941,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rom 1941 to 1945,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rom 1946 to 1963 before it gained autonomy and joined Malaysia in 1963. Sarawak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cademic attention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anks to its common use of English and relatively stable status. Academic research saw an abrupt growth after World War II. This article reviews three major anthropological topics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in Sarawak, including kinship, religion and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makes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Sarawak.

Key words: Austronesian, Sarawak, kinship, religion, ethnic relationship